



ULSZ3094 Project II

论李永平〈拉子妇〉与梁放〈龙吐珠〉中弱势群体的压迫书写

*The Depiction of Marginalized and Their Oppression in Lee Yung Ping's A La-tzu
Woman and Liang Fang's Long Tuzhu*

Angel Lau Shao Qin

刘绍琴

23ALB01041

指导教师：李树枝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ULSZ3094 Project II

论李永平〈拉子妇〉与梁放〈龙吐珠〉中弱势群体的压迫书写

*The Depiction of Marginalized and Their Oppression in Lee Yung Ping's A La-tzu
Woman and Liang Fang's Long Tuzhu*

Angel Lau Shao Qin

刘绍琴

23ALB01041

指导教师：李树枝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6 Angel Lau Shao Qi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课题背景简介	3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5
第三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9
第四节、研究范围	10
第五节、研究方法	10
第六节、初步研究成果	12
第二章 多重压迫结构的分析	14
第一节、族群压迫：“血统纯正”话语下的排斥与约束	14
第二节、性别压迫：交织于族群关系中的女性身体书写	17
第三节、阶级压迫：经济与文化资本不对等下的权力固化	21
第三章 从“他者凝视”到“自我叙述”的转型	25
第一节、叙事视角的鸿沟：“他者凝视”与“自我叙述”	26

第二节、人物塑造的艺术：从“缄默符号”到“破碎主体”	29
第四章 结语	33
参考文献	35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刘绍琴 Angel Lau Shao Qin

学号：23ALB01041

日期：2026 年 4 月 23 日

论文题目：论李永平〈拉子妇〉与梁放〈龙吐珠〉中弱势群体的压迫书写

学生姓名：刘绍琴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论文以李永平〈拉子妇〉与梁放〈龙吐珠〉为核心研究对象，聚焦两部作品中弱势群体的压迫书写，探讨其在族群、性别与阶级交织结构下如何呈现原住民女性与混血后代的边缘处境。研究主要回应两个问题，其一，压迫如何被建构；其二，压迫如何被呈现与感知。

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结合文本细读与比较文学路径，通过人物称谓、叙事视角、空间安排及语言细节的分析，揭示压迫如何在日常生活与话语实践中被不断再生产。同时进行平行比较，考察两部作品在叙事策略、情感结构与人物塑造上的差异，从而呈现砂华文学在表达路径上的多样性。

研究发现，两部作品中的压迫并非单一结构，而是族群排斥、父权秩序与经济不平等交织而成的多重权力结构。其中，“中国性”作为文化认同话语，一方面指涉文化归属，另一方面亦在具体社会关系中转化为排他性的权力逻辑，并与性别及阶级因素相互强化。在叙事层面，〈拉子妇〉主要通过华族家庭的外部视角展开，形成带有伦理反思意味的“他者凝视”，其批判多体现为对他者处境的同情与反思；〈龙吐珠〉则以混血主体的第一人称叙述展开，使压迫经验以内在经验形式直接呈现，实现由“被观看者”向“自我发声者”的转变。在人物塑造上，两部作品亦呈现出由“符号化受难者”到“主体经验呈现”的不同书写取向。〈拉子妇〉中的原住民女性多被置

于沉默与被动的位罝，而〈龙吐珠〉中的叙述者则呈现出身份撕裂与情感矛盾的复杂心理结构，显示压迫不仅是外在结构，也进一步内化为个体的身份认同矛盾。

综上，本论文在既有将两部作品纳入马华文学“少数民族书写”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语境细分与分析重置，将其置于砂华文学的地方经验脉络中加以考察。进一步引入“弱势群体”这一分析维度，以回应文本中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与权力位罝差异。研究显示，两部作品所呈现的书写对象，不仅体现族群他者化的叙事逻辑，同时也涉及阶序关系、性别结构与后殖民语境下的多重弱势处境，并深植于婆罗洲在地社会历史与权力关系之中。这一探讨不仅拓展了婆罗洲书写的内涵层次，也为重新审视马华文学中交错的族群关系与结构性不平等提供了具体的文本依据。

关键词

李永平〈拉子妇〉；梁放〈龙吐珠〉；压迫书写；弱势书写

致谢

本论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树枝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从选题到修改均给予了重要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感谢课程老师在学习过程中所提供的知识与启发，也感谢同学们在交流中给予的支持与意见。最后，感谢家人和朋友在写作期间的理解与鼓励，使我能够顺利完成本论文。

第一章 绪论

李永平的〈拉子妇〉于 1972 年发表于《文学杂志》，原名为《土妇的血》。¹ 梁放〈龙吐珠〉于 1984 年获得了全砂文艺创作比赛中的冠军之作，被收录于《烟雨砂隆》和其的自选集《腊月斜阳》里。²

李永平（1947–2017）是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暨翻译家，出生于砂拉越古晋。³在创作初期，他以婆罗洲为主要书写场域，创作了《婆罗洲之子》《拉子妇》等作品。其文学实践始于中学阶段，早期作品多刊载于砂拉越本地报刊。⁴虽然当时语言青涩，但这一阶段的创作描绘了婆罗洲原住民与华人族群的生存境遇，体现出对地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照。他毕生致力于中文书写实验，著有《吉陵春秋》《海东青》及“月河三部曲”等。除创作外，李永平亦翻译多部西方文学经典，是跨文化书写的实践者。其挚友高嘉谦曾指出，李永平晚年居于淡水河畔，常观河望山，视此景为精神上的原乡映照，既勾连起对婆罗洲故乡河流的怀想，亦寄托着离散者安顿身心的渴望。

梁放（1953– ），原名梁光明，是砂拉越的在地华裔作家。⁵他出生于砂拉卓小镇，其职业生涯长期服务于水利灌溉局。土木工程的专业背景与深入乡野的工作经历，使其对砂拉越的地理生态与社会民情有着切身而细致的观察。自 1970 年代起，梁放持续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及多部散文集。与同样出身砂拉越却长期在台发

¹ 李淑君，〈从“她族”映照“中国性”：从〈红纱笼〉到〈拉子妇〉的道德优越到自我赎罪〉，《台东大学人文学报》2016 年第 1 期，页 140。

² 张康文，〈“华”“拉”之变：《龙吐珠》及梁放的族群书写〉，《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2011 年第 3 期，页 3。

³ 马仑、潘碧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191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页 139。

⁴ 康闵旭，〈离散与多乡带来的挑战：李永平〉，《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共公司，2022），页 425–426。

⁵ 张康文，〈“华”“拉”之变：〈龙吐珠〉及梁放的族群书写〉，页 1。

展的李永平不同，梁放始终扎根于故乡生活与书写，被黄锦树学者视为“砂拉越最主要的在地代表”。⁶ 他的创作展现了砂拉越多元族群社会以及地方经验的真实生存状态。

在马华文学的宏观版图中，砂华文学（既砂拉越华文文学）因其特殊的历史轨迹与文化质地，呈现出迥异于西马的文学史脉络。⁷ 不同于西马文学常盘桓于“华人”主体性与国族认同的辩证关系，砂华文学的生成呈现出“先砂拉越、后马来西亚”的层次性。这种认同逻辑催生了强烈的地方意识，使其文学取向转向对“婆罗洲书写”的自主建构，其独特性深植于这一具体而复杂的地域经验之中。蔡晓玲指出部分砂华作家其实并不认同“马华文学”这一统摄性的标签，而更强调自身的“砂华”身份认同。⁸ 例如李永平就曾在采访中说过“我这辈子没有接近过马来西亚，没写过马来半岛，只写婆罗州”。⁹

这种地域独立性不仅体现在身份认同上，也影响了文本中族群关系的呈现方式。相较于马华文学中常见的“华族作为受压迫者”或边缘者的叙事，部分砂华文学作品开始呈现更为复杂的族群互动结构，其中还涉及华族与原住民族群之间的不对等关系。

⁶ 黄锦树，〈文学的犀鸟之乡——序梁放小说《腊月斜阳》〉，《腊月斜阳：梁放小说自选集》（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18），页 12。

⁷ 魏月萍，〈梁放小说中的“主体认同”与“书写认据”意识〉，《马华文学批判大系：魏月萍》（桃园市：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2019），页 48-52。

⁸ 蔡晓玲，〈在台砂华文学或在地砂华文学：从地域经验看雨林书写〉。论文发表于“第二届文化流动与知识传播——台湾文学与亚太人文的多元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2016 年 6 月 25 - 26 日。
<https://eprints.um.edu.my/16086/1/0001.pdf>。

⁹ 伍燕翎、施慧敏整理，〈浪遊者——李永平访谈录〉，星洲日报文艺春秋（上）（下），2009 年 3 月 15 日，https://kemunasiwa.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_3824.html。

第一节、课题背景简介

本论文将〈拉子妇〉与〈龙吐珠〉从马华文学的宏观范畴中进一步细分，并置于砂华文学的脉络下加以考察，主要出于作家书写取向与文本内容特征的双重考量。

首先，从创作主体来看，李永平曾明确指出其写作始终围绕婆罗洲展开，而梁放的作品内容多取材于当地社会经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指向性。其次，从文本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认同取向来看，砂华与马华文学间亦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本论文进一步关注文本内部的权力运作机制，尤其是华族在地方社会中所占据的相对优势位置，以及其如何在具体情境中对原住民族群形成结构性的压迫关系。

在身份认同层面，两者亦展现出不同的文化指向。马华文学长期以来多围绕中国之“根”的文化追寻展开，而砂华文学虽然同样涉及“根”的问题，却往往更具体地指向砂拉越这一地方经验。同时，在部分文本中，对“血统纯正”的强调亦使族群界线被进一步强化，使“种”的问题成为重要的认同维度之一。正是在此意义上，将相关作品置于砂华文学的语境中考察，更有助于揭示其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与认同结构。

这两部作品都聚焦于当地少数民族与华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内容反复出现一个关键词汇——“拉子（lakia）”。该词是砂拉越华人对原住民，即是伊班族（Iban）及比达友族（Bidayuh）的闽南语称呼，泛指“没有文化的土人”。¹⁰ 不过，根据载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里林开忠的〈异族的再现？——从李永平的《婆罗洲之子》与《拉子妇》谈起〉里提到“拉子”源于“daya”或“dayah”一词的音转，其本身

¹⁰ 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2012），页 569。

未必带有歧视意图。尽管如此，许多伊班学者认为该词在实际使用中蕴含着轻蔑的意涵，部分华人从政者也认同这一看法，并且这种带有贬义的用法至今仍在延续。

在这两部作品中，“拉子”一词被两位作者形塑为犀利的文学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华族社群深藏的文化倨傲，在文中具体体现如下：

1. 对一个死去的拉子妇表示过分的悲悼，有失高贵的中国人的身份啊！¹¹
2. 倘若我不喊拉子，而用另一个好听点、友善点的名词代替它，中国人会感到很别扭的。¹²
3. 怎么有你这孩子的，黑黝黝的，拉子种。¹³

这两部作品共同将“拉子”这一充满争议的称谓，转化为剖析族群关系，揭示权力结构的重要符号，通过日常语言中潜藏的歧视意识与家庭伦理中固化的等级观念，深刻展现了华族社群如何利用根深蒂固的文化倨傲作为武器，在面对原住民“他者”时，通过维持族群边界来消解其深层的道德困境。

在分析与呈现这种族群关系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成为了重要的叙事议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对立、从属、平等及和而不同的复杂关系形态，映照出不同权力结构与情感立场的交织。¹⁴ 在〈拉子妇〉中，“他者”是被再现为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而在其作品里的“自我”，却并非以强势的压迫者姿态出现，反而是一种“同情”的姿态出现完成其叙事与伦理目的，从而写成复杂的他者凝视结构。¹⁵

¹¹ 李永平，〈拉子妇〉，《婆罗洲之子与拉子妇》（台北：城邦文化出版，2018），页 96。

¹² 李永平，〈拉子妇〉，页 97。

¹³ 梁放，〈龙吐珠〉，《马华文学文本解读》，页 576。

¹⁴ 李卫华，〈论比较文学研究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 年第二期，页 119。

¹⁵ 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页 557。

而在〈龙吐珠〉中，“自我”转而成为弱势主体，“他者”则指向掌握权力的华族群体。

这两部作品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展示了压迫的运作。从李永平的“他者凝视”符号化的受难，到梁放的“主体发声”内化的身份焦虑。将这些作品从宏观马华文学范畴中细分出来，更有助于揭示砂华文学内部复杂的认同结构，以及其如何通过“压迫书写”完成对地域经验的深刻省思。

对比两部作品的异同，研究发现华族在文本中展现的倨傲心态，本质上是建立在族群等级制与经济优势基础之上的。华族男性利用这种阶级与族群的双重优势，对原住民女性实施了进一步的性别压制。与此同时，原住民在社会竞争中的弱势处境及其相对温和的族群性格，也使得这种单向的压迫关系在家庭与社会场域中得以固化。在叙事层面，这种压迫呈现出从“他者凝视”向“自我觉醒”的转型。李永平通过外部视角将受压迫者塑造成沉默的客体符号，而梁放则赋予了“他者”发声的权利，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揭示了“自我”与“他者”在血缘与身份上的痛苦撕裂。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李永平的〈拉子妇〉与梁放的〈龙吐珠〉都属于相同的题材，不过在研究数量上却有明显的差距。学者黄锦树曾通过比较指出〈龙吐珠〉的受害者视角书写比起〈拉子妇〉加害者家属视角书写在情感层次的复杂性与批判力度的穿透性上均呈现出更为

丰富的文本肌理。¹⁶ 从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拉子妇〉所累积的学术关注与阐释深度,却是远超〈龙吐珠〉。张康文在其研究论文〈“华”“拉”之变:〈龙吐珠〉及梁放的族群书写〉里指出,两部作品在学术研究数量上的显著差距,实际上反映了文学场域中“文化资本”分配不均的结构性问题。¹⁷ 前人研究已从多重维度对李永平〈拉子妇〉及相关文本展开了深入探讨,尤其聚焦于历史记忆、族群暴力与“他者”再现等关键议题。

在婆罗洲与砂华文学的研究脉络中,张康文的〈他在婆罗洲写作:论梁放〉指出〈龙吐珠〉印代的悲剧性人生,实则可视为砂拉越历史变迁的隐喻性呈现。¹⁸ 蔡晓玲的〈在台砂华文学或在地砂华文学:从地域经验看雨林书写〉里指出砂华文学在马华的框架外建立了独特的地理文化想象。砂华文学通过深耕地域经验,转向对“婆罗洲书写”的自主建构。¹⁹

在历史记忆载体与揭露华族暴力的讨论方面,张锦忠指出〈拉子妇〉实为对婆罗洲殖民历史与离散经验的一种“再记忆”实践。他认为,拉子妇的沉默失语与叙事者的愧疚难言,共同构成了马华社群无法摆脱的集体创伤,深刻反映出历史结构性暴力在个体命运中的症候。²⁰ 庄蕙洁的〈用忏悔进行永远的祭祀:李永平的〈拉子妇〉〉该文指出〈拉子妇〉是华裔书写者对少数民族“他者”的凝视与想象。叙述者的“忏悔”视角是一种伦理实践,旨在通过文学叙事重建被压迫者的尊严,揭示华族意识形态中的暴力。²¹

¹⁶ 黄锦树,〈文学的犀鸟之乡——序梁放小说《腊月斜阳》〉,页12。

¹⁷ 张康文,〈“华”“拉”之变:《龙吐珠》及梁放的族群书写〉,页3。

¹⁸ 张康文,〈他在婆罗洲写作:论梁放〉,《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页322-324。

¹⁹ 蔡晓玲,〈在台砂华文学或在地砂华文学:从地域经验看雨林书写〉。

²⁰ 张锦忠,〈记忆、创伤与李永平小说里的历史——重读《婆罗洲之子》与《拉子妇》〉,《马华文学批判大系:张锦忠》(桃园市: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2019),页159-173。

²¹ 庄蕙洁,〈用忏悔进行永远的祭祀:李永平的〈拉子妇〉〉,《马华文学文本解读》,页570-571。

在身份认同与“中国性”的讨论方面，林美春和高嘉谦分别在《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和高嘉谦〈谁的南洋？谁的中国？——试论〈拉子妇〉的女性与书写位置〉都揭露了〈拉子妇〉中的“中国性”执念，认为对血统纯正的坚持导致了对异族的排斥。高嘉谦指出原住民女性在文本中被置于权力的最底层，其身体被物化为满足欲望或劳动的工具。²²

孙彦庄在〈宋子衡、小黑、梁放短篇小说试论〉指出伊班族母亲“印代”是华族男权意识下的牺牲品，通过描写混血后代在文化与血统混杂中的挣扎，展现了砂拉越土地上边缘族群被占有、遗弃与从属的悲剧命运。²³ 姬高歌的〈从“中国性”到“华人性”：海外华人身份的建构及其流变〉从历史维度解析“中国性”内涵的变化。它阐释了海外华人如何通过固守文化正统性来建构身份。²⁴ 林开忠在〈“异族”的再现？——从李永平的〈婆罗洲之子〉与〈拉子妇〉谈起〉一文中指出，李永平小说中的原住民形象呈现为类型化、功能化的“他者”，是服务于华族自我认同建构的文学符号。这些反射自身文化焦虑、道德困境与身份危机的书写策略，暴露了跨族群叙事中难以超越的本位视角与再现困境。²⁵

在“他者”理论层面，张剑在〈“他者”略说〉阐述了萨特和拉康的“凝视”理论，指出凝视并非中立行为，而是一种暗示权力位阶的不平等互动，为本论文中的“他者凝视”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²⁶ 冉倩的《斯皮瓦克女性“他者”形象批判研究》

²² 高嘉谦，〈谁的南洋？谁的中国？——试论〈拉子妇〉的女性与书写位置〉，《马华文学批判大系：高嘉谦》（桃园市：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2019），页 67-85。

²³ 孙彦庄，〈宋子衡、小黑、梁放短篇小说试论〉，《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 年 2 月，页 28-32。

²⁴ 姬高歌，〈从“中国性”到“华人性”：传统中国对海外华人身份的建构及其流变〉，《东南亚研究》2026 年第 2 期，页 132-133。

²⁵ 林开忠，〈“异族”的再现？——从李永平的〈婆罗洲之子〉与〈拉子妇〉谈起〉，2003 年 7 月 13 日。https://mychhsk.blogspot.com/2021/04/blog-post_752.html。

²⁶ 张剑，〈“他者”略说〉，《外国文学》2011 年第 1 期，页 118-127。

探讨了“底层人能否说话”。通过对第三世界女性被双重边缘化的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与本土男权对女性主体的“二次殖民”，直接支撑了本论文里关于“失语”与“发声”机制的探讨。²⁷ 李卫华的〈论比较文学研究中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论述了自我与他者之间对立、从属、平等的关系。指出“他者”是自我定义的参照，而克服对立与从属、走向“和而不同”是文学研究的终极指向，有助于本论文分析两部作品中族群关系的异同与演变。²⁸

前人研究更进一步探讨了小说书写背后的心理动机与压迫机制的复杂性与循环性。郑秀方在〈罪孽、堕落与盼求救赎的冀望：解读李永平的书写版图〉中指出，李永平的创作始终贯穿着对罪孽、堕落与救赎主题的深切叩问。她认为，〈拉子妇〉中的性别压迫与道德沉沦，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华人社群在流离散居状态下，其文化身份焦虑与欲望失序的微观呈现，从而为理解边缘女性所承受的多重剥削，如性别、种族、道德等提供了关键的文本线索。正是这种源于身份迷失的集体性“罪孽感”，驱使作者不断书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以求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救赎”。²⁹ 张康文的〈他在婆罗洲写作：论梁放〉在比较〈拉子妇〉与〈龙吐珠〉时指出，后者通过混血叙事者的双重身份，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这双重身份论证了压迫的复杂性，它不仅来自外部，如〈拉子妇〉中纯粹的华族视角，更内化于混血后代的身份认同与行为中。这揭示了压迫书写的更深层次，即是压迫的循环与复制。³⁰

²⁷ 冉倩，《斯皮瓦克女性“他者”形象批判研究》（长沙：中南大学文艺学硕士论文，2024），页8。

²⁸ 李卫华，〈论比较文学研究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页119-123。

²⁹ 郑秀方，〈罪孽、堕落与盼求救赎的冀望：解读李永平的书写版图〉，《华人文化研究》2014年第2卷第2期，页196-197。

³⁰ 张康文，〈他在婆罗洲写作：论梁放〉，页322-324。

现有研究已对〈拉子妇〉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的阐释，从历史创伤、身份认同、文化背景到叙事伦理，形成了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相比之下，〈龙吐珠〉虽在叙事视角与批判机制上展现出独特的突破性，却因“文学文化资本”的相对匮乏，尚未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学术关注。

第三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论文以李永平的〈拉子妇〉与梁放的〈龙吐珠〉为核心文本，聚焦于其中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书写。尽管前人研究已从“中国性”的执念、历史创伤的再记忆以及压迫的内化与循环等角度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本论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可拓展的学术空间。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篇文本分析或特定理论视角的切入，尚缺乏将两部作品置于“压迫书写”这一共同母题下进行的系统性比较研究。由于两作都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叙事立场下的族群观察，将其并置研究，能更清晰地勾勒出砂华文学在处理边缘族群命运时的范式演变。〈拉子妇〉中基于华族男性的“同情凝视”与〈龙吐珠〉中混血主体的“自我叙述”构成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张力。这种视角差异不仅影响了人物的呈现方式，更决定了压迫在文本中是作为一种“被观看的社会处境”，还是作为一种“被经历的生命现实”而存在。此外，文论文中压迫并非单一维度，而是族群、性别与阶级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结构，对此种多重压迫的系统梳理，亦是现有研究中有待深化的部分。

基于此，本论文旨在达成的目的有：

一、揭示李永平〈拉子妇〉与梁放〈龙吐珠〉的多重压迫结构。

二、探讨压迫结构在叙事视角与人物塑造中的呈现及其文学经验的转化。

第四节、研究范围

根据〈拉子妇〉与〈龙吐珠〉的文本特性与研究目标，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将紧密围绕两部小说的叙事视角、人物关系与话语策略展开，重点剖析文本内部如何通过具体的文学机制呈现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在研究对象上，本论文以两部作品中的原住民女性与混血后代为核心，关注其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边缘处境，并结合族群、性别与阶级三个维度，对压迫结构的构成及其运作加以分析。

在分析路径上，本论文首先从文本内容出发，探讨“血统纯正”与“文化正统”等话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不断强化，并与父权制度及经济资源分配相互勾连，形成对原住民女性与混血群体的多重压制。后转向叙事层面，考察不同叙事视角，如“他者凝视”与“自我叙述”与人物塑造方式，如何参与压迫经验的呈现，并使其在文本中转化为可被观看或被体验的文学经验。

两部作品虽共享砂拉越跨族婚姻这一相似叙事背景，但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与情感结构，呈现出族群、性别与阶级压迫交织的不同书写路径。本论文通过细读与比较，揭示文学文本如何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参与权力关系、身份建构与伦理经验的生产。

第五节、研究方法

本论文将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与比较文学研究法，构建多层次的研究框架，以深入剖析〈拉子妇〉与〈龙吐珠〉中的压迫书写与叙事方式。

首先，本论文将采用文本细读法对两篇作品进行详细的阅读和分析，主要关注在语言表达、叙事方式与细节描写所承载的意义。“细读”概念源自西方“新批评”理论，强调以具体阅读实践为核心，从细微处入手发掘文本的深层意涵，而非停留于宏观主题概括。³¹之所以采用此方法，是因为两部作品中关于族群压迫与身份差异的呈现，往往并非直接论述，而是通过人物称谓、叙述视角及日常生活细节间接建构。若仅从主题层面进行归纳，容易忽略文本内部复杂的情感层次与叙事张力；而文本细读则能够使分析建立在具体文本证据之上，从而提升论证的细致性与解释力。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法是本论文的核心研究路径。比较文学强调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与差异，通过跨文本的并置与对照，突破单一文本研究的局限。³²在方法上，本论文采取平行研究的思路，即不追溯作品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而是从文本内部出发，对处于相似议题与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作品进行结构性比较。其重点不在于确认作品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于通过对照呈现其在相似语境中的不同表达，从而凸显各自的叙事特征。平行研究的价值，正是在于通过差异化比较揭示文本如何在不同语境中生成各自的意义结构与伦理立场。³³

基于此，本论文将〈拉子妇〉与〈龙吐珠〉置于“弱势群体”的共同语境下，展开多维度的比较分析。比较重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其一，在叙事视角层面，分析“他者凝视”的外聚焦视角与“自我叙述”的内聚焦视角如何建构不同的认知框架与情感距离；其二，在情感结构层面，探讨“同情而不介入”的旁观姿态与“内在化

³¹ 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页202。

³² 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页242-244。

³³ 钟义，〈从自述到共述——论比较文学的主体性经验新认知〉，《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页70。

的痛苦经验”之间的差异及其所体现的伦理指向；其三，在叙事表达层面，分析弱势群体在有限发声条件下所采取的多样化表达策略及其意义生成方式。

通过比较文学研究法的运用，本论文能够在文本并置中呈现差异结构，避免将弱势群体书写简化为单一的主题表达。同时，比较文学研究法与文本细读法形成互补，前者着重揭示文本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后者则提供微观层面的文本支撑，从而增强整体论证的系统性与说服力。

第六节、初步研究成果

通过对〈拉子妇〉与〈龙吐珠〉的细读及初步的比较分析，本论文已取得以下阶段性认识。

初步研究证实，两部作品中的压迫是严丝合缝的。“中国性”在砂拉越特定语境下，不仅是文化防线，更是一种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准入证”。原住民女性在失去经济主权的同时，也失去了得到尊重的机会，这种双重剥削在文本中具有高度的系统性。

在对比分析中发现，两作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形成了从“外部观察”到“内部探入”的互补效果。〈拉子妇〉采用旁观者视角，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照见了华族社会在面对他者时那种复杂的道德挣扎与同情，从社会外部勾勒出压迫的轮廓；而〈龙吐珠〉则通过第一人称叙述，直接切入被压迫者的精神世界，将无形的血统焦虑与下一代的身份困境具象化，完成了从个体内部对压迫感的深度挖掘。这种“由外及

内”的叙事转向，不仅让读者看到了肉体上的苦难，更揭示了精神层面的深远影响，两者共同构成了对砂华文学压迫结构的完整表述。

研究初步勾勒出砂华文学在处理边缘族群形象时的一条审美演进线。三婶的形象更多承载了作者对族群暴力反思的“符号功能”，而〈龙吐珠〉中的“我”则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具有反抗潜能但又深陷自卑的“破碎主体”。这种转型标志着砂华文学正从“书写他者”向“深入他者内部经验”迈进。

初步探讨发现，这两部作品直接面对了砂拉越社会中华族与原住民之间真实的相处困境。这种来自婆罗洲的切身体会，两位作者将目光投向了更现实的问题，不同族群、不同阶级之间那道看不见却又极其厚重的界线，并试图挖掘这些界线是如何伤害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的。

第二章 多重压迫结构的分析

庄蕙洁学者指出：

少数民族拉子所不能超越的命运，是生生不息的种族与性别政治循环之恶果。³⁴

这句话表明了〈拉子妇〉与〈龙吐珠〉所呈现的并非单一维度的压迫，而是一种由族群、性别与阶级多重因素交织而成。作品中的原住民女性及混血后代，并非仅因“异族身份”而被排斥，更在父权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共同作用下，被持续推向社会与家庭的边缘位置。

因此，本章将从多重压迫的视角出发，对文本中的权力关系展开深入分析。本章将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从族群维度出发，探讨“血统纯正”与“文化正统”话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不断强化，并转化为对异族成员的排斥与规训。其次从性别维度切入，分析原住民女性身体如何在父权与族群意识的双重作用下被物化与工具化，进而失去主体地位。最后从阶级维度考察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本的不对等分配，如何为上述压迫提供结构性支撑，并使其在家庭与社会中得以持续再生产。

第一节、族群压迫：“血统纯正”话语下的排斥与约束

“中国性”是用来概括海外华人中国文化特质与身份认同的概念。³⁵ 20 世纪末，随着族群研究的发展，王赓武、施坚雅等学者在研究东南亚华人社群时提出这一概念，用以指称华人在语言、习俗与价值观中所保留的中国文化印记。“中国性”不仅是一

³⁴ 庄蕙洁，〈用忏悔进行永远的祭祀：李永平的〈拉子妇〉〉，页 571。

³⁵ 姬高歌，〈从“中国性”到“华人性”：传统中国对海外华人身份的建构及其流变〉，页 132-133。

种文化特征，也隐含以中国为中心的正统性想象，与国族认同密切相关。高嘉谦学者指出“纯粹中国性”的核心在于对“种”的血缘坚持，无论是宗族意义上的延续，还是民族层面的认同，皆离不开这一基础。³⁶ 在〈拉子妇〉与〈龙吐珠〉中，华族都以“文化正统”与“血统纯正”为核心价值，将自身置于优势位置，并在家庭与日常生活中对当地原住民形成持续的排斥与压制。

〈拉子妇〉中“纯粹中国性”的执念深深扎根在“我”家族的文化传统中，并渗透在日常相处的各个层面里。通过日常的相处互动，形成一整套排斥与约束异族成员的方式。其根源在于对自身“高贵”血统与文化的高度强调，由此衍生出对异族群体的排斥心理。当族群边界被触及时，将通过权威性与情绪化的语言表现出来，强化群体内部的认同与排他意识。文中祖父得知三叔迎娶“拉子”后的激烈反应，正是这一文化心理的具体呈现。在文本中的情绪体现如下：

1. 赫然震怒，认为三叔玷辱了我们李家的门风。³⁷

2. 拍桌子、瞪眼睛、大骂三叔是“畜生”³⁸

3. 我把他给“黜”了³⁹

作者通过极富冲击力的动作描写，如“拍桌”、“瞪眼”与具有门第观念色彩的强烈词汇，如“黜”、“玷辱”勾勒出祖父作为家族权力核心的绝对权威。同时利用众人的集体沉默进行侧面烘托，展现了族群排他意识在家族内部是如何形成一种压倒性的心理禁锢。通过这一场景，可以清楚看到华族父权家庭对异族婚姻的强烈排斥，而家族成员的沉默，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这种排斥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

³⁶ 高嘉谦，〈谁的南洋？谁的中国？——试论〈拉子妇〉的女性与书写位置〉，页 83。

³⁷ 李永平，〈拉子妇〉，页 97。

³⁸ 李永平，〈拉子妇〉，页 97。

³⁹ 李永平，〈拉子妇〉，页 97。

在〈龙吐珠〉最明显的便是用餐时的空间区隔：

吃饭时，他一个人在桌上开饭。……印代与我却坐在桌子脚边的草席上，匍匐着
留着铁盘内的食物。⁴⁰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空间对比的手法，通过“桌上端坐”与“地席匍匐”的视觉反差，将家庭内部隐形的等级制度外化。“匍匐”一词不仅描绘了身体的姿态，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在族群与父权双重压力下卑微的生存现状；而餐具铁盘的细节描写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冷漠感。这种空间上的差异直观折射出双方在家庭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强化了族群带来的双重隔阂。餐桌在这里不再是团圆的象征，而是划清界线的战场。

这种排斥进一步延伸至下一代的成长过程。〈拉子妇〉中三叔为三婶所生的三个孩子取名为“狗仔”“龙仔”等带有贬低意味的小名，这些看似日常化的称呼，实际上隐含着对混血身份的轻视与否定。此外，三叔还时常不耐烦地对待他们，以难听的言语辱骂他们，如“蠢东西，爬开去！”⁴¹。〈龙吐珠〉中父亲经常以“怎么有你这孩子的，黑黢黢的，拉子种”⁴²辱骂“我”。

两位作者通过语言策略，如“爬”、“种”等带有动物性指向的动词与名词，完成了对混血后代的人格贬抑。〈龙吐珠〉中对肤色特征“黑黢黢”的反复强调更是将生理特征转化为一种文化污名。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展现了个体的残忍，更通过与〈拉子妇〉的互文对照，揭示了“非我族类”的亲子关系将被隔离在华族话语之外。

⁴⁰ 梁放，〈龙吐珠〉，页 576。

⁴¹ 李永平，〈拉子妇〉，页 106。

⁴² 梁放，〈龙吐珠〉，页 576。

两部作品互为补充，展现了“纯粹中国性”如何渗透并重塑家庭生活，将其演变为排挤异族者的社会缩影。在华族的话语体系下，族群界线通过贬低性的命名与言语羞辱被不断固化，使混血孩子在成长中被迫内化这种“异类感”。这不仅损害了他们的人格尊严，更从根本上否定了其作为华族后代的身份。就如高嘉谦学者所说的“生下的混血儿只能是‘她的孩子’”⁴³。

这种多维度的排斥，从婚姻的拒斥、用餐的空间隔阂到命名的语言暴力，使原住民女性及混血后代始终无法获得平等的认同与接纳。他们在这种观念的重压下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境遇，而这正是两篇作品共同揭示的属于砂拉越里深层社会的问题。

第二节、性别压迫：交织于族群关系中的女性身体书写

在〈拉子妇〉和〈龙吐珠〉这两篇作品中，原住民女性身体始终未被视为独立的个体存在，而是满足男性生理欲望的工具。这一现象反映出当时华族父权观念与族群排斥相互交织的社会现实，使原住民女性的身体被物化，并被贴上族群与性别的标签，也呈现出她们在社会中的艰难处境。无论是〈拉子妇〉中的三婶，还是〈龙吐珠〉中的伊班族母亲，她们的人生经历都受到这种双重压迫的影响，其身份、劳动与尊严均在不同程度上被忽视甚至侵犯。

首先在〈拉子妇〉中，三婶在敬茶的时候就被祖父仪式性的身份否定。祖父通过“茶盘拍翻，泼茶一脸”的暴力行为完成了对异族媳妇的排斥。作者通过动作描写与细节呈现，将原本象征家族接纳的敬茶仪式异化为一场公开的暴力。祖父拍翻茶盘的举动，不仅是生理性的攻击，更是一种文化仪式上的驱逐。这种在“众目睽睽”下的

⁴³ 高嘉谦，〈谁的南洋？谁的中国？——试论〈拉子妇〉的女性与书写位置〉，页 83。

羞辱，利用视觉上的狼狈“泼茶一脸”深化了族群边界的不可侵犯性，深刻揭示了在华族父权与族群的双重压迫下。异族女性作为“他者”在华族空间内被彻底剥夺尊严的生存实相。祖父骂完就走，这种剥夺辩解权的行为，将三婶置于家族权力结构中极度孤立的境地。其异族身份非但未带来包容，反而成为加剧羞辱与边缘化的依据。

这种排斥进一步表现为对女性身体的工具化剥削。三叔直言“拉子妇天生贱，怎好做一世老婆？”⁴⁴。这不仅暴露出深层的族群歧视，更揭示了女性在华族父权家庭中仅存的“工具性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当三婶面对丈夫出轨的背叛时，家族内部的华族女性并未展现出性别立场上的同情，反而表现出对三叔行为的默许甚至赞赏。诸如“三叔不是糊涂人”“三叔是有眼光的商人”等评价，反映出家族成员已达成一种集体共识，即原住民女性仅是被消费的商品，而非对等的生命个体。作者在这里使用了极强的叙事讽刺。在正常的道德语境下，出轨是背叛，但在该家族的语境中，这反而成了“商人眼光”的体现。“天生贱”、“怎么做一世老婆”“商人眼光”这种价值观的扭曲，深刻地讽刺了家庭内部那种以“利害”代替“情感”、以“商品”看待“生命”的冷酷逻辑。

这种歧视甚至渗透进三婶的母职空间，当她哺乳时，旁观的华族女性在一旁“阴阳怪气”地拿其种族身份调侃，将哺育行为消解为一种带有歧视的种族窥视，进一步剥夺了她作为母亲的尊严。哺乳本是最具私密性、最神圣的母职时刻，但作者通过“旁观”和“调侃”的描写，展示了空间尊严的丧失。华族女性的“阴阳怪气”不仅是语言攻击，更是一种“窥视”。这种手法将三婶从“母亲”还原为“拉子”，将其

⁴⁴ 李永平，〈拉子妇〉，页109。

神圣的生理行为降格为一种可供玩味的种族特征，表现了压迫是如何渗透进最私人的生活缝隙中的。

然而，这种基于族群优越感的“合谋”并不能掩盖华族女性自身的被动地位。作品中有一个极具张力的细节，当母亲试图出于善意为三婶辩护时，祖父仅用一句“你妇人家不懂得这个道理”⁴⁵便将其噤声。这是一个极具深度的对比结构，作者没有让华族女性只充当“坏人”，而是安排了母亲的“善意”。这种对比揭示了压迫的复杂性。母亲的失败证明了在那个家里，华族女性虽然在族群地位上高于原住民女性，但在父权的权力结构中同样是受害者。祖父那句“你妇人家不懂”，通过性别话语的降维打击，将华族女性与原住民女性再次拉回到同一个被压制的水平线上。这一情节深刻地勾勒出家庭内部压迫的多重阶序，原住民女性处于最底层，而华族女性虽在族群身份上优于前者，但在父权威权面前，依然缺乏有效的话语权与主体性。

对异族女性的剥削在作品中的另一处细节也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三婶刚生产完毕，三叔便强迫其在烈日下曝晒咸鱼，宁愿压榨产后妻子的劳动力也不愿花钱雇工。三婶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其身体的人格价值从未得到真正的认可，再次突显了异族女性在华族父权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这种对女性身体的劳动力榨取，在〈龙吐珠〉中则演变成为一种更为长期的、合同式的身份剥削。在〈龙吐珠〉里“我”的母亲是父亲来到砂拉越后“娶来长期服务”的女人。“我”的母亲既没有正式婚姻地位，也没有获得与父亲平等的尊重。其身份被简化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既要满足父亲的生理需求，又要承担家务与生育的责任，却始终没有获得正式妻子的地位，也无法得到社会层面的认可。

⁴⁵ 李永平，〈拉子妇〉，页 97。

综合两部作品可以发现，《拉子妇》中的祖父、三叔与《龙吐珠》中的父亲在家庭中是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地位既来自他们作为华族男性的身份，更得益于传统家长的家庭权威。凭借这种双重优势，他们确立了家庭内部的阶序规则，并对女性成员进行全方位的支配与评判。华族男性处于权力的核心；华族女性则通过维护“族群纯正”的话语，在心理上获得了优于原住民女性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后者的排斥；而原住民女性则处于阶序的最底层，承受着族群与性别的双重放逐。

即便跨越族群边界进入华族家庭，原住民女性也因“血缘不纯”而难以获得真正的认同，其身份被永久性地推向边缘。她们的人格价值被窄化为单一的生育功能与生理补偿，一旦失去这些功能，便面临被轻视甚至抛弃的命运。高嘉谦指出海外华人通过固守“中国性”的排他性，来维持族群内部的纯粹与优越感。⁴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异族女性被视为可以随时迎娶或弃置的附属品，其存在仅仅是为了填补男性的欲望真空，而其个体的意愿与生命需求则被系统性地忽视。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所论证的“女人从来不构成一个与男性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换和订立契约的等级”⁴⁷。在这两部作品的语境下，原住民女性在进入华族家庭之初，便处于一种非对称的契约关系中。她们出卖了劳动与身体，却因族群与性别的双重压迫，始终无法换取对等的家庭地位与话语权。即便是华族女性，也难以完全置身于这一压迫结构之外。因此，这种深陷父权秩序边缘、难以自拔的生存困境，构成了砂华文学中关于族群裂痕与性别压迫书写的重

⁴⁶ 高嘉谦，《谁的南洋？谁的中国？——试论〈拉子妇〉的女性与书写位置》，页83。

⁴⁷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郑克鲁译，《第二性》合卷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页546。

要母题。然而从更广阔的文学与文化视域来看，这一命题亦具有跨地域的普遍性，指向现代社会中结构性不平等关系的持续运作。

第三节、阶级压迫：经济与文化资本不对等下的权力固化

在前两节对族群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分析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发现〈拉子妇〉与〈龙吐珠〉中所呈现的不平等关系并非仅建立在血缘与性别的差异之上，其深层动力源于经济地位与文化资本的非对称分布。阶级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一个经济范畴，其根源深深植根于个体在生产关系中所占据的不同位置。⁴⁸ 换言之，族群差异与性别不平等之所以能够在家庭与日常生活中长期维持，正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着稳定的经济结构作为支撑。在这种结构中，华族男性不仅是性别的统治者，更是生产的垄断者。在这两篇作品中，华族男性多以资源掌控者，如商人的身份出现，垄断了家庭的生产与社会的话语权；相比之下，原住民女性则被剥夺了经济独立性，被禁锢在“妻子”或“附属者”的位置。这种在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固化了权利格局，使得族群与性别的双重压迫在日常生活中被不断地“再生产”。

首先从经济层面来进行剖析，〈拉子妇〉与〈龙吐珠〉中的父亲，其权威的合法性并非仅源于性别，更源于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拉子妇〉中的三叔作为商人，因具备经济能力，所以拥有话语权。文本中三婶声音处于微弱且被边缘化的状态，无法对现有的权力结构构成实质性挑战。即使在极端情境中，三婶也只能以哭喊的方式作出无力回应，缺乏真正的抗辩空间，在文中体现如下：

⁴⁸ 张彦修，《婚姻·家族·氏族与文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页198-199。

1. 爸就是常喝酒，喝完了就抓妈来打。⁴⁹

2. 爸骂妈和阿春 XX。⁵⁰

作者通过对三婶话语权的剥夺，将三婶的抗争限制在无意义的“哭喊”中，剥夺了其在族群与父权话语中的辩解权。同时，通过运用暴力描写，将“抓”、“骂”、“打”等动作处理为一种循环的家庭日常，深刻揭露了在三叔绝对支配下的非对称权力结构。这种从属地位不仅体现在肉体的损伤上，更体现在这种压迫在叙事视角，如孩子的目睹中被呈现为一种无可奈何的“秩序”。

这种表现显示出三叔在家庭中的绝对支配地位，而三婶则始终处于被动与从属的位置。正因为掌握资源，他才拥有“选择”与“抛弃”的权力，而三婶则由于缺乏经济独立性，只能被动接受这一切。〈龙吐珠〉中父亲作为从中国南来砂拉越谋生的华族男性，占据着家庭经济的核心位置，而“我”与母亲则依附于他的经济供养而生存。这种依附关系，使母亲难以对父亲的行为提出质疑，也使“我”在成长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其次，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进行剖析。这种阶级差异进一步被强化并自然化。华族不仅掌握经济资源，同时也掌握对“正统文化”的定义权。“中国性”的观念在实际上不仅是族群认同的体现，也是一种文化资本的象征。黄锦树认为，这种认同源自对传统文化的深切依恋与自豪感，随着这种情感的不断强化，那些被认定为可能威胁其文化正统性的异族文化便容易引发排斥、反感甚至恐惧的心理反应。⁵¹

⁴⁹ 李永平，〈拉子妇〉，页 109。

⁵⁰ 李永平，〈拉子妇〉，页 109。

⁵¹ 黄锦树，〈马华女性文学批判的本土探索之路——序林春美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林春美，〈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雪兰莪：大地出版社，2009），页 23。

“中国性”赋予华族以“正统”、“文明”、“优越”的位置，使其在面对原住民时，能够以评判者与规范制定者的身份出现。此类言论不仅否定了原住民女性的情感认同，也进一步划定了“高贵”与“低贱”的文化界线。在这一意义上，原住民女性之所以被视为“低等”或“可替代”，不仅因为其族群身份，也因为她们被排除在主流文化资本之外。她们的语言、生活方式与身体特征，都被纳入一种被贬低的体系之中。这种文化上的边缘化，与经济上的依附关系相互作用，使她们在家庭与社会中难以获得真正的认可。

由于原住民女性在经济上依附、在文化上被贬低，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便被视为“正常”甚至“应当如此”。同样，混血子女所遭受的歧视，也不仅源于血统问题，更与其所处的阶级位置密切相关。这一点在文本中亦有具体体现：

在学校里我不可以稍为发脾气，不可以打架，怕的是给指责“拉子性情”“拉子种”，就连阿爸也不承认我的血统，从不跟我说福建话，华语更不必说了。⁵²

这里作者展现了“我”的内心独白与反复句式“拉子”的运用，呈现出混血主体在族群压迫下的自我规训与身份焦虑。“不可以发脾气，不可以打架”强化了行为限制的严苛性，也暗示了外在规训已内化为主体的自我约束。这里的“怕”，并非单纯的情绪反应，而是一种在长期压迫下形成的心理机制，体现了权力如何由外部规训转化为内在控制。

作者深刻呈现了混血后代在华族文化与阶级双重夹缝中的生存困境。父亲拒绝教授母语的行为，不仅是沟通的断裂，更是对其族群归属感的象征性放逐。然而对日常情绪的控制让个人慢慢失去自我。在这一叙述中，语言的缺席与情绪的压抑清楚显示

⁵² 梁放，〈龙吐珠〉，页 577。

出其在文化资本上的被剥夺与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边缘位置。他们既无法完全进入汉族的文化体系，也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从而长期处于身份与阶级的双重边缘。

〈拉子妇〉与〈龙吐珠〉所呈现的压迫结构，实际上是族群、性别与阶级三者交织的结果。族群界线之所以被反复强调，性别不平等之所以被视为理所当然，正是因为它们与既有的资源分配结构相互契合。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再生产与自然化。正如黄锦树所指出的，“中国性”通过对“正统文化”的选择与强调，形成一套具有排他性的价值体系。⁵³在这两篇小说中，这种“中国性”正是通过经济优势与文化资本的结合，被具体落实为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与情感结构。从阶级视角出发，揭示了压迫的运作方式，也得以进一步理解，“中国性”本身如何在具体社会关系中被不断实践、强化，甚至转化为一种排除他者的工具。这也正是两部作品在呈现个体命运之外，更深层地指向的结构性问题所在。这两部作品不仅是族群关系的写照，更是一场关于“内部殖民”的文学解构。在后殖民语境下，原住民女性作为“他者的他者”，其失语与异化不仅揭示了父权的暴力，更揭示了文化霸权如何通过对边缘族群的物化，完成了对主体性的二次殖民。⁵⁴

⁵³ 黄宁宁，《黄锦树小说的中国性研究》（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页30。

⁵⁴ 冉倩，《斯皮瓦克女性“他者”形象批判研究》，页8。

第三章 从“他者凝视”到“自我叙述”的转型

纵观第二章得出〈拉子妇〉与〈龙吐珠〉所呈现的并非单一层面的族群冲突，而是一种由族群、性别与阶级交织而成的压迫体系。这两部作品不仅揭示了个体悲剧的生成方式，更指向一种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即所谓的“中国性”如何在具体社会关系中转化为排他性的文化实践，并与父权体制及阶级结构相互勾连，形成对“他者”的持续压制。

在此基础上，本章将从第二章文本里的压迫现象探讨转向这些现象背后的表达方式。本章将进一步追问，这些压迫关系如何通过具体的叙事方式被呈现、转化与感知。所以，本章将聚焦于文本层面，探讨“压迫如何被书写与感知”。在这一转变中，叙述的角度变得非常重要。不同的立场不仅会影响“他者”是如何被描写的，也会影响主体的经历能不能被看见、被理解。〈拉子妇〉中的“他者凝视”与〈龙吐珠〉中的“自我叙述”，体现了两种差异化的叙事路径，前者让“他者”能够被看见，并进入公共的道德与关注范围；后者则进一步使其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身的经验。两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共同加深了对压迫经验的理解。

因此，本章将不再仅仅停留于揭示压迫本身，而在于分析不同叙事方式如何从各自位置参与建构并呈现压迫的意义，并在不同的叙事方式中，分别呈现出各自关注的重点与表现层次。

第一节、叙事视角的鸿沟：“他者凝视”与“自我叙述”

在文学书写中，叙事视角不仅决定了故事的呈现方式，也深刻影响着文本的情感张力。〈拉子妇〉与〈龙吐珠〉虽然同样涉及华族与原住民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混血群体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边缘处境，但两者在叙事立场上的差异使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结构。这种差异可理解为“他者凝视”与“自我叙述”两种叙事路径的并置与张力，并非简单的优劣之分，而是各自承担不同的叙事功能。它不仅构成叙事上的鸿沟，也直接决定了文本中人物内在经验的呈现程度与读者的伦理介入深度。〈拉子妇〉主要采用华族家属的观察视角，而〈龙吐珠〉则以混血后代“我”的第一人称叙述。

首先，〈拉子妇〉所采用的华族家属视角，本质上是一种带有距离感的“他者凝视”。张剑学者就在〈“他者”略说〉里指出凝视并非中立的视觉行为，而是一种暗示权力位阶的不平等互动。通过对“他者”的归纳与定义，其主体性往往被压缩为可被理解与分类的对象。⁵⁵ 在〈拉子妇〉中，三婶的主体性确实受到压抑。她并非作为具备完整主体意识的个人存在，而是更多以被观看、被评价的“他者”形象出现。叙述者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但这种同情仍然受限于其所处的族群立场。“我”和二妹仅仅只是口头上的惭愧，除了去山里探望拉子妇一次以外就没有别的举动了，文中写道：

1. 我们同情她，我们爱护她，可是我们两个到头来谁也没开口。⁵⁶

2. 我和二妹却没有这个勇气，而且连呐喊的力气也没有。⁵⁷

⁵⁵ 张剑，〈“他者”略说〉，页119-120。

⁵⁶ 李永平，〈拉子妇〉，页107。

⁵⁷ 李永平，〈拉子妇〉，页107。

这种叙事立场在揭示问题的同时，也呈现出其内在限制，叙述者虽能意识到压迫的存在，却难以真正突破既有的族群结构。然而，这种“有限的自觉”本身，亦构成了文本的重要批判维度。华族家庭凭借其压倒性的人数、经济优势以及对“正统文化”的阐释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排他性的声音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任何支持异族或反抗权威的微弱声音都会因为害怕被群体孤立而选择噤声。⁵⁸ 三婶的“哑静”，正是在这种社会压力之下形成的一种“失语状态”。在此意义上，这种“他者凝视”的叙事方式虽难以深入主体内部经验，却能够呈现出压迫如何在主流话语中被合理化甚至日常化。

其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龙吐珠〉采用了混血后代“我”的第一人称叙述。种从压迫结构内部展开的“自述”，使个体经验得以直接呈现。如果说三婶更多停留在被观看的位置，那么〈龙吐珠〉中的“我”则通过叙述重新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在这一视角中，压迫不再只是外部可观察的现象，而是转化为一种被身体与情感所承受的现。如在〈龙吐珠〉里“我”所表达的强烈情绪：

1. 当时我多么希望他们立刻死掉，阿爸和印代。⁵⁹

2. 我恨透那老师，他知道我有一个伊班母亲。⁶⁰

文本深入到受压迫者的感官与意识层面。“我”所流露出的极端情绪显示压迫已不再停留于外部结构，而是转化为个体内部可被感知与承受的情感经验。用餐空间的描写尤具象征性，父亲端坐桌前，而“我”与母亲则在桌脚边进食。这种空间差异不仅是社会结构的体现，也通过第一人称的感知转化为一种具体的身体经验，使读者更

⁵⁸ 郭心茹，《论马华小说在身份建构上的“自我”与“他者”》（霹雳：拉曼大学中文系学士论文，2021），页17。

⁵⁹ 梁放，〈龙吐珠〉，页578。

⁶⁰ 梁放，〈龙吐珠〉，页580。

直接地感受到压迫的存在。相较于〈拉子妇〉的外部观察，这种内部叙述并非取而代之，而是补充了前者难以触及的经验层面。它使那些原本可能被忽略的情绪，如“羞耻”、“怨恨”与“身份焦虑”得以显现，并转化为可被感知的叙事内容。

这种“自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沉默机制。〈拉子妇〉中，三婶的失语体现的是被压制的结果；〈龙吐珠〉中，“我”的发声则呈现出主体在压迫结构中的挣扎与回应。例如，“我”在同学面前否认母亲身份，以及面对父亲困境时产生的复杂情绪，都是这种内在冲突的体现。因此，两种叙事并非简单对应“沉默”与“发声”，而是分别呈现了压迫结构中的不同位置与经验层次。

如果说〈拉子妇〉的价值在于让华族社会“看见”他者，从而意识到自身结构中的问题，那么〈龙吐珠〉的批判意义则在于让“他者”自我表达，使压迫经验获得更直接的呈现。学者黄锦树曾指出，〈龙吐珠〉的受害者视角书写，在情感层次的复杂性与批判力度的穿透性上，均比〈拉子妇〉的加害者家属视角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文本肌理。⁶¹但这并不意味着〈拉子妇〉的叙事失去意义，相反，其带有限度的他者凝视恰恰揭示了主流社会如何在不自觉中参与压迫结构的运作。

〈龙吐珠〉中，家庭不再是避风港，而是族群等级制的微缩模型，每一句对“拉子种”的辱骂，都是对“我”灵魂的一次切割。这种叙事不仅展示了压迫的结果，更揭露了压迫如何在个体心理中留下无法愈合的褶皱。这种能够深入主体内部的叙述能力，或许也与作者的个人经验有关。

梁放之所以能够深入呈现混血个体的内在视角，亦可从其个人经验中获得一定解释。根据访谈资料里，梁放提到他非常喜欢和原住民相处，也会在肯雅族的部落里住

⁶¹ 黄锦树，〈文学的犀鸟之乡——序梁放小说《腊月斜阳》〉，页 12。

一段时间。⁶² 这种深入地方社会的生活经验，使其对原住民文化与日常处境具有更为细腻的体察，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作品中能够进入“他者内部”的叙事提供了现实基础。

综上所述，〈拉子妇〉通过外部视角的“他者凝视”，旨在揭示一种社会悲剧并引发读者的伦理反思；而〈龙吐珠〉则通过内部视角的“自述”，揭示了这种结构如何作用于个体经验与心理层面。二者并非相互取代，而是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互补。这种视角的差异，展现了文学如何同时承担“使他者被看见”与“使其能够发声”的双重功能。

第二节、人物塑造的艺术：从“缄默符号”到“破碎主体”

叙事视角的选择决定了文本中人物之间的主导关系，在这一结构下形成的人物形象，构成了压迫关系最直接的呈现方式。从〈拉子妇〉到〈龙吐珠〉，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呈现出从以外部视角为主的“符号化呈现”逐步过渡到更强调内部经验的“主体化书写”。前者更倾向于通过人物的沉默、行为等外在表现来折射其所处的处境，使这些细节不仅停留在表层描写，而是带有对其生存经验的间接指向。“符号”至“主体”的转变不仅是文学技巧的演进，更是受压迫者主体性在文本中不断“被呈现出来”的过程。就文本中所呈现的原住民性格底色而言，李永平与梁放的文学表征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⁶² Kychia, 〈马华作家梁放：犀鸟的呼唤〉，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7年8月11日，<https://www.sinchew.com.my/20170811/%E9%A9%AC%E5%8D%8E%E4%BD%9C%E5%AE%B6%E6%A2%81%E6%94%BE%EF%BC%8E%E7%8A%80%E9%B8%9F%E7%9A%84%E5%91%BC%E5%94%A4/>

梁放在采访中也提到：

伊班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乌龟壳，放在家门口，对我的父母说，如果有人来，你们觉得不安全，就大力敲打乌龟壳，伊班人听到巨响就会过来帮忙。⁶³

孙彦庄学者对〈龙吐珠〉就提及：

砂拉越土著伊班人的低微社会地位及其善良、逆来顺受、忍耐力强的民族性格令印代成为阿爸“回唐山”意识与行为的牺牲品，加强了故事的悲剧性。⁶⁴

李永平与梁放均敏锐地捕捉到了土著族群性格中极度隐忍与顺从的一面，并将其置于华族男权结构之中进行书写，使其成为承受多重压迫的重要人物基础。

首先在〈拉子妇〉中，李永平通过“留白与侧写”的手法，将三婶塑造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象征性形象。由于第一节所述的，在作品里“他者凝视”占据了绝对地位，三婶的主体意识被弱化，转而成为承载华族罪恶感的文化符号。作者并不描写三婶“在想什么”，而是通过描写她“做了什么”以及“别人如何对待她”来完成形象建构。她更像是一个被剥离了个人欲望、以承受为主要特征的“受难形象”。全文叙述依托“我”这一华族视角，在带有反思意味的回望中展开，这种书写方式本身即构成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艺术策略。

此外，三婶从出场到死亡，她始终都处于一种低眉顺眼的从属姿态。就连死亡的时候也仅仅是一句“没想到八个月后，拉子婶静静死去了”⁶⁵。这种近乎去情节化的处理，在弱化个体细节的同时，强化了其作为受压迫群体象征的意义，也进一步强调族群压迫的稳固性，也凸显结构性压迫的稳固性。学者庄蕙洁认为这种通过“他者化”

⁶³ Kychia, 〈马华作家梁放：犀鸟的呼唤〉。

⁶⁴ 孙彦庄, 〈宋子衡、小黑、梁放短篇小说试论〉, 页 31。

⁶⁵ 李永平, 〈拉子妇〉, 111 页。

不断叠加受难图景的手法，既揭示了华族意识形态中的暴力结构，也通过叙述者的反思视角，形成一种伦理层面的自我检视。⁶⁶

相较于三婶以外部视角建构的沉默形象，在〈龙吐珠〉中，“我”则是呈现为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破碎主体”。梁放在借助第一人称叙述，展示了压迫如何深入个体内部，塑造出复杂且矛盾的心理结构。叙事者“我”的性格呈现出明显的撕裂状态，既有对母亲的深爱，又有对“拉子血统”的排斥；既有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又有在父亲落魄时产生的报复性快感。这种人物塑造表明，压迫不仅是外部施加的力量，同时也会转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理冲突。通过“否认母亲”“匍匐用餐”等细节，文本具体化了身份焦虑，使“我”成为一个在文化夹缝中不断自我撕扯的存在。这种塑造让读者看到的，不再只是受压迫者的处境，而是压迫如何在主体内部留下持续作用的痕迹。

〈拉子妇〉侧重于通过人物的“符号化”呈现压迫的结构性，〈龙吐珠〉则进一步通过“主体化”书写，将这种结构转化为可被体验的个体经验。在这一意义上，人物塑造不再只是形象建构的问题，也成为理解更大历史与文化处境的入口。这两篇作品在人物塑造上的差异，最终引发了学者对婆罗洲土地命运的理解。张康文学者认为〈龙吐珠〉的身份是面对始乱终弃的人生，并且将其理解为砂拉越的隐喻：

砂拉越一度是汶莱王国的属地，后割让予布洛克家族，二战后转让英国，最终再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份子，印代、玛拉阿坦的遭遇正呼应东马的从属及被占有、遗弃、贩卖的命运。⁶⁷

⁶⁶ 庄蕙洁，〈用忏悔进行永远的祭祀：李永平的〈拉子妇〉〉，页 570。

⁶⁷ 张康文，〈他在婆罗洲写作：论梁放〉，页 323。

这种从“象征性形象”到“内在经验呈现”的艺术转变，最终仍落实于人物塑造层面的深化。无论是三婶的沉默，还是“我”的撕裂，均不再只是个体命运的书写，而是承载着对婆罗洲历史处境与文化认同的复杂回应。

综上所述，〈拉子妇〉与〈龙吐珠〉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由“符号化”向“主体化”的不同路径。前者通过沉默与留白，使压迫结构得以被看见；后者则通过心理书写，使压迫进入个体经验层面。两者并非相互取代，而是在不同层面上拓展了族群书写的表现空间。一者呈现结构，一者深入主体，共同构成对族群关系与身份问题的立体理解。这种差异也使人物塑造不仅停留于形象层面，而成为连接历史、文化与个体经验的重要中介。

第四章 结语

本论文以李永平〈拉子妇〉与梁放〈龙吐珠〉为核心文本，从族群、性别与阶级三重维度出发，对砂华文学中弱势群体的压迫书写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这两部作品所呈现的压迫是多重权力结构组成的。在这一体系中，“中国性”不仅作为文化认同的象征存在，更在具体社会关系中转化为排他性的权力机制，并与父权制度及经济结构相互勾连，共同作用于原住民女性与混血后代，使其长期处于被边缘化与被规训的状态。

在叙事层面，从“他者凝视”到“自我叙述”，不仅标志着叙事视角上的变化，更体现出压迫经验在文本中呈现方式的深化。在〈拉子妇〉中，原住民女性作为被观看与被界定的对象，其处境得以进入主流叙述与伦理反思的范围，但其主体意识始终受到限制；而在〈龙吐珠〉中，压迫则进一步内化为个体的情感经验与心理结构，使原本难以被触及的羞耻、焦虑与撕裂得以显现。人物塑造亦呈现出由“符号化”向“主体化”的转变路径。〈拉子妇〉中的三婶更多作为承载压迫结构的象征性形象而存在，其沉默与被动强化了结构性压迫的稳定性；而〈龙吐珠〉中的“我”则以“破碎主体”的形式，呈现压迫如何深入个体内部并持续作用。

因此，这两种叙事方式并非彼此取代，而是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互补。前者使压迫结构得以被“看见”，后者则使压迫经验得以被“感受”。正是在这种视角与人物塑造的双重转型之中，砂华文学对族群关系与身份问题的书写，逐渐从外部批判走向内部揭示，也使文学文本成为理解历史处境、文化认同与主体经验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作品虽同样涉及族群关系与压迫经验，但其叙述重心并未落在传统马华文学中常见的对中国“根”的追寻，而是转向对现实处境中族群权力关系与个体生存经验的书写。换言之，身份认同的问题并未消失，而是在叙事中发生了重心转移，由对“归属何处”的追问转向对“如何在既有结构中生存”的反思。将其置于砂华文学的语境中加以考察，从而更能凸显其对在地族群关系、权力结构与混血经验的持续关注与书写特征。

（18874 字）

参考文献

专书

1. 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 林美春，《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雪兰莪：大地出版社，2009年。
3. 梁放，《腊月斜阳：梁放小说自选集》，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18。
4. 李永平，《婆罗洲之子与拉子妇》，台北：城邦文化出版，2018。
5. 马仑、潘碧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191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6. 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2012。
7. 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 张彦修，《婚姻·家族·氏族与文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9. 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

专章

1. 高嘉谦，〈谁的南洋？谁的中国？——试论〈拉子妇〉的女性与书写位置〉，《马华文学批判大系：高嘉谦》，页 67-86。桃园市：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2019。

2. 魏月萍, 〈梁放小说中的“主体认同”与“书写认据”意识〉, 《马华文学批判大系: 魏月萍》, 页 48-66。桃园市: 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2019。
3. 张锦忠, 〈记忆、创伤与李永平小说里的历史——重读《婆罗洲之子》与《拉子妇》〉, 《马华文学批判大系: 张锦忠》, 页 159-174。桃园市: 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2019。

译著

1.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郑克鲁译, 《第二性》合卷本,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期刊论文

1. 姬高歌, 〈从“中国性”到“华人性”: 传统中国对海外华人身份的建构及其流变〉, 《东南亚研究》2026 年第 2 期, 页 130-158。
2. 李卫华, 〈论比较文学研究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 页 119-123。
3. 李淑君, 〈从“她族”映照“中国性”: 从〈红纱笼〉到〈拉子妇〉的道德优越到自我赎罪〉, 《台东大学人文学报》2016 年第 6 卷第 1 期, 页 123-153。
4. 孙彦庄, 〈宋子衡、小黑、梁放短篇小说试论〉, 《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 年 2 月, 页 28-32。
5. 张剑, 〈“他者”略说〉, 《外国文学》2011 年第 1 期, 页 118-127。
6. 张康文, 〈“华”“拉”之变: 〈龙吐珠〉及梁放的族群书写〉, 《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2011 年第 3 期, 页 1-18。

7. 郑秀方, 〈罪孽、堕落与盼求救赎的冀望: 解读李永平的书写版图〉, 《华人文化研究》2014 年第 2 卷第 2 期, 页 181-200。
8. 钟义, 〈从自述到共述 ——论比较文学的主体性经验新认知〉, 《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25 年第 42 卷第 2 期, 页 70-74。

学位论文

1. 郭心茹, 《论马华小说在身份建构上的“自我”与“他者”》, 霹雳: 拉曼大学中文系学士论文, 2021。
2. 黄宁宁, 《黄锦树小说的中国性研究》,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4。
3. 冉倩, 《斯皮瓦克女性“他者”形象批判研究》, 长沙: 中南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4。

会议论文

1. 蔡晓玲, 〈在台砂华文学或在地砂华文学: 从地域经验看雨林书写〉, 第二届文化流动与知识传播——台湾文学与亚太人文的多元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北, 2016 年 6 月 25 - 26 日,
<https://eprints.um.edu.my/16086/1/0001.pdf>。

网络资料

1. 林开忠, 〈“异族”的再现? ——从李永平的〈婆罗洲之子〉与〈拉子妇〉谈起〉, 2003 年 7 月 13 日, https://mychhsk.blogspot.com/2021/04/blog-post_752.html。

2. 伍燕翎、施慧敏整理，〈浪遊者——李永平访谈录〉，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上）（下），2009年3月15日，

https://kamunasiwa.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_3824.html。

3. Kychia，〈马华作家梁放：犀鸟的呼唤〉，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7年8月11日，

<https://www.sinchew.com.my/20170811/%E9%A9%AC%E5%8D%8E%E4%BD%9C%E5%AE%B6%E6%A2%81%E6%94%BE%E5%BC%8E%E7%8A%80%E9%B8%9F%E7%9A%84%E5%91%BC%E5%94%A4/>。